

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与资源配置能力问题研究

○林民书 杨治国

摘要: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原因,可以有多种的解释。我们认为自然环境、政策以及体制等方面无法全面解释我国地区发展的差距,地区资源配置能力却是影响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最根本原因。需要研究不同地区影响其资源配置能力的具体原因,寻找提高落后地区资源配置力的途径以及政策措施,从而协调地区经济发展,缩小我国地区发展差距。

关键词:地区经济差距;要素聚集;资源配置能力

中图分类号: F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488(2010)04-0042-09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也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尽管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是大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种难以避免的伴生现象,但是过于扩大化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将弱化国家整体经济的再生能力,并且为民族关系的和睦与稳定带来消极影响。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国内外的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研究领域出发,对我国区域经济差距产生的原因做了细致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假说,并给出了很多颇有价值的建议。这些研究对于理解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很有帮助,但是它们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不足。正是这些不足之处激励我们对此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本文拟在地区资源配置能力的框架内重新探析这一问题,对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寻求我国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新思路。

一、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及其相关研究

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是一种常态。历史上,中国

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就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而且,不同时期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展现出的特点和具体原因具有时代的特征。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中央高度集权性的计划经济体制,为改变区域之间极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格局,中央政府采取了“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统筹兼顾、发挥优势、均衡发展”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在资金、技术、人才、建设项目等方面向中西部倾斜,特别是当时为备战需要,将经济建设和产业布局重点放在“三线”地区。均衡发展战略改变了旧中国生产力布局的严重畸形状况,使中西部地区在非常落后的基础上得到较迅速发展,缩小了与东部的差距。三大地带与各省市的人均国民收入差异在1976年以前,呈缩小趋势,虽然1967年到1976年,差距有所扩大,但总体上这一阶段区域差异并不显著。另一方面,均衡发展战略在实践上影响了东部地区原有经济、技术存量优势的充分利用,“三线”建设以国防原则取代经济原则,投资效益很差,并对以后的经济结构调整付出很大代价。

改革开放后,国家从加快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出

作者简介:林民书,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治国,厦门大学经济系研究生。

发,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生产力布局作了重大调整,实施了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即“向东倾斜,梯度推进”战略。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思想的指导下,中央对东部沿海地区赋予了一些倾斜性的扶持政策,东部沿海地区率先进行体制变革,为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创造了先机。1988年明确提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对东部沿海地区在财政、税收、信贷、投资等方面进一步给予优惠。自此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全国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但是伴随而来的东西部地区经济和居民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使我国区域经济陷入严重失衡状态。

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主要表现:

东部沿海与内地、东西部、以及城乡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虽然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一直大力扶持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政府在财政和投资上向边远和落后地区倾斜,虽然如此,然而效果不佳,付出的代价非常大。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区域发展由平衡发展战略转向不平衡发展战略,东部沿海优先发展,政策和投资向沿海地区倾斜,推动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由此拉大了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发展差距。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中,最高的广东达35696.46亿元,最低的西藏只有395.91亿,广东是西藏的90倍,是湖南的3.1倍,贵州的10.7倍(3333.40亿元),青海37倍(961.53亿元)。江苏2004年15003.60亿元,2008年为30312.61亿元,分别是临近安徽的3.1和3.4倍,两地的差距在扩大。就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看,2008年江苏、浙江、广东分别为39633.42214和37589元,数倍于湖南(17521)、贵州(8824)、云南(12587)青海(17389)。地区发展差距在地区人均消费水平上得到具体表现。2008年各地区人均消费水平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分别为27343元、14390元、11013元、13893元,而贵州、云南、青海分别只有4426元、4553元、5830元,上海市是它们的4~6倍,东部沿海地区人均消费水平远高出中西部地区。

不仅东西部经济存在差距,即使原先是我国工

业重要基地的东北地区,也由于东南沿海地区经济迅速崛起,其经济的领先地位开始动摇。广东江浙地区后来居上,不仅在增长速度上超过传统老工业基地的东北地区,而且人均GDP的绝对值上也超过了北方地区,工业重镇辽宁省,近年来经济发展水平已降到全国第10位左右,黑龙江和吉林省的排名也逐步下降。

地区发展差距的扩大,必然引起学术界的重视。Gen Long Ying^①(1999)对中国1978-1994年这一时间区域中各省的GDP数据进行分析,发现1978年以来,中国地区差大致乎形成一个先小幅下降而后持续上升的“U曲线”,地区增长在改革初期具有明显的收敛性但随后又呈现显著的发散趋势,特别是1990年以后,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不断拉大,沿海和内地差距已经成为中国地区差距的最主要方面。

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经济差距的逐步扩大,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公平问题,由此中央政府指出必须从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出发,发挥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实行地区倾斜与产业倾斜政策相结合的方式,在继续发挥东部地区增长优势的同时,逐步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发展。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但是,从西部大开发以来区域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区域经济差异并没有得以消除,区域政策效应不明显。袁晓玲等^②(2005)以基尼系数为分析工具,着重分析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东西部地区各年基尼系数的动态变化情况,其研究结论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成效,但是效果并不显著,且东西部间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廖涛等^③(2006)以四川省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引入了金融实证研究中常用的时间研究法对评价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效果有参考价值的九个指标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其研究结果显示就四川省而言,西部大开发战略在缩小东西部间的差距上效果并不显著。

陈良文、杨开忠^④(2007)将改革开放后我国区

域差异变动的基本情况总结概括为以下三点:一是1978年以来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地区之间的区域差异趋于不断拉大,而1990年以来这一趋势更为明显,截至2004年,东部地区人均GDP已经分别是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的2.6倍、2.2倍和1.4倍。二是1978-1990年间我国省份之间人均GDP差异趋于缩小,但1990年以来区域差异不断拉大。我们以各省份间人均GDP变异系数来衡量省份之间的经济差异,结果显示1978-1990年间区域差异趋于缩小,1991年以来区域差异不断拉大。三是1990年以来经济活动趋于向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少数大都市圈地区集聚。1978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为34.74%,到1990年这一比重仍然维持在34.35%的水平,但1990年代以来经济活动向大都市圈地区集聚的趋势不断加强,截至2004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已经超过40%。这种差距的形成,理论界倾向于认为是市场化条件下形成的,而解决的手段通常都是主张采用非市场的办法。

二、我国理论界对中国区域发展差异的解释

地区增长差异问题受到广泛关注,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众多学者对中国地区差距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并且尝试解释其形成原因及变化趋势。概括起来,目前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地域区位说。认为中国各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地区发展不平衡。二是政策倾斜说。认为国家对东部地区实行的多方面的政策倾斜,是区域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或重要原因。三是体制因素说。认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各地区体制转轨程度的不同导致的市场化程度差异以及传统体制下形成的要素和产品价格扭曲的延续造成了地区发展差距的拉大。

1 区位要素差异说

陆铭、陈钊^⑤(2005)基于对东部沿海、沿江等

地理位置上具有优势的地区取得更快发展的原因分析,证明了地理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姚枝仲、周素芳^⑥(2003)的研究表明,地区差距的主要根源在于地区间要素禀赋的差异,资本相对丰富的地区比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地区的人均收入要高,因而缩小地区差距必须尽快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市场。

傅晓霞、吴利学^⑦(2006)通过考察了各因素对中国地区增长收敛的影响,发现人均资本虽呈发散趋势,但很不显著;而技术效率的发散趋势则明显得多,表明技术效率效应是造成地区增长发散的关键性因素。由于存在改善技术效率的障碍,转轨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比劳均产出具有更强的发散趋势,短期内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地区增长收敛,如果落后地区不能突破体制等发展障碍,地区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

2 政策缺陷说

林毅夫、刘培林^⑧(2003)则认为,不同的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区域经济的失衡。较之东部,中、西部的发展战略更接近于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中、西部地区推行的不当的工业发展模式是导致逐渐扩大的地区差距的重要原因。

马栓友、于红霞^⑨(2003)分析了1994年新财税体制改革以后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收敛的关系,发现转移支付总体上没有达到缩小地区差距的效果,原因是转移支付的资金效率较低,转移支付的资金分配不科学和不公平。

3 体制差异说

蔡昉、王德文、都阳^⑩(2001)通过实证分析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绩效的各种因素,发现劳动力价格扭曲影响要素配置效率,并认为由此产生的效率差异,是促成近年来区际收入差距扩大与中国地区发展不协调的深层原因。

王燕梅认为,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固然与国家预算内投资向东部地区的倾斜和给予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地区大量优惠政策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东、西部制度推进上的差异。即东部地区市

场化进程较快,而西部落后地区在投融资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制度变革要缓慢得多。

(四)小结

这些文献为我们理解我国区域差异形成和扩大的原因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视角。尽管如此,上述部分研究在不同的方面都存在一定的不足:如从地理条件角度来解释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实际上,1990年以来地理条件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很小,以一个不变的变量来解释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动较为牵强;从资源禀赋的角度进行分析也缺乏实证支撑,欠发达地区经济不能充分发展不在于缺乏必要的资源,如资金。就资金的投入上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不支持资金投入弱化是西部经济不发达原因的说法。多数研究报告表明:自我国经济市场化以来,资金的主体流向是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转移。尤其近几年,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存在着存款大于贷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如何配置只接受市场价格的调节,资源总是流向配置效率高的地区,问题的关键在于欠发达地区缺乏有效组织利用生产要素的能力。因此,无论我们向西部地区投入多少资金,只要其资金的利用率不高,就难以留住和继续吸引资金到西部地区。也就难以走出西部地区一方面严重缺乏资金,另一方面资金又不断流向发达地区的怪圈。再如从政策与体制的角度解释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化趋势,东西部目前的差距确实与改革之初的政策差异有关,但是实际上,1990年以来我国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中央政府的倾斜政策、地区间的市场分割都逐步趋于削弱,而在此过程之中我国区域差异反而趋于扩大,可见政策差异也不能说很好的解释我国区域差异的变化趋势。

上述几种观点都是在封闭经济的框架下进行分析,仅考虑了各地区的经济增长而忽视了地区之间的要素流动对地区经济差异的影响,一个国家内部各地区之间的劳动、资本等要素基本上是完全自由流动的,很多时候,一国内部发达地区之所以成为发达地区并不一定是完全依靠自身资源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是因为大量的生产要素从其他

地区流入,因而区域经济差异不仅包括各地区之间经济增长快慢的差异,还包括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流动的差异,因此基于封闭经济框架下进行的分析难以完全解释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动。

即使上述实证研究中地理条件、制度或市场化程度以及政策等能够被证明对经济发展差距具有某种程度的影响,这些因素各自作用的大小又是如何?到底那种因素作用更大,理论上仍没能给予证明,实际上,上述各种原因发生作用,主要是由于它们对资源配置能力的影响。基于这些原因,我们认为需要从地区资源配置能力的分析视角,重新审视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发展差距问题。

三、地区资源配置能力及其影响因素

资源的稀缺性以及由此引起的选择需要。由于资源的有限,资源短缺的问题是人类无法回避的难题,如果解决不好,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就难以深入继续下去。使用,如何将稀缺性的资源分配于各种经济活动中,以便更好地满足人类生产、生活等方面的需要,实际上就是资源配置的问题。资源配置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无论马克思还是西方经济学都把资源配置的问题作为研究的重要内容。西方经济学认为当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社会资源就得到最优配置。然而,一个国家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不同地区却有不一样的结果。对于相互竞争的地区而言,有意义的本地区对资源的配置能力,正是资源的配置能力的差异,决定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现有文献对资源配置问题的考察往往局限于能否达到最优状态,忽视了对资源配置能力的研究。我们认为,研究地区发展差距,还应该从市场条件下地区资源配置能力问题出发,分析影响我国不同地区资源配置力的具体因素,寻找提高落后地区资源配置力的途径以及政策措施,从而协调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一)资源配置能力的内涵

要对资源配置能力进行分析,首先要限定资源概念的范围。一般来讲,资源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

之分。通常认为,广义的资源包括能够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如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制度资源、技术资源、资金资源、市场资源、区位优势、信息资源、文化资源与政策资源等等。而狭义的资源通常指投入生产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资金三大基本要素。相对于人类社会的无限的需求欲望,用来满足人们需求的资源总是稀缺的。资源的稀缺性,导致任何社会都面临着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这三大基本经济问题。资源配置是指一个经济社会中各种资源在各个经济领域、在各种不同的使用方向之间的分配,是人们对经济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在各种可能的生产用途之间作出的选择。研究资源配置的目的在于如何合理地把各种资源分配到不同的经济领域、不同的用途上去,使用较少的资源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一个社会的经济要发展,社会财富要迅速增长,关键是要看该社会中稀缺的经济资源,能不能得到最有价值的运用。

已有对资源配置的研究中,直接从资源配置能力角度进行分析并且对资源配置能力的内涵进行说明的文献较为罕见。傅允生认为,在经济研究中的资源配置可以理解为要素资源集合,资源配置能力指要素资源的存在状况与集合方式及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所具有的功能,以及由此形成的经济规模与绩效。若以 Z 代表资源配置能力,以 X 代表要素资源存在状况, Y 代表资源配置方式,那么资源配置能力与要素资源存在状况以及要素资源配置方式的关系可以抽象为: $Z = F(X, Y)$ 。^⑩

资源配置能力与要素聚集和资源控制力以及资源使用效率是有差别的。控制力谈及的是将要素控制在本地地区,并没有涉及到使用的效率问题。要素聚集是要素在某一区域的集中,这是资源配置的结果,要素的聚集并不代表集聚的要素资源就能得到合理的利用。资源配置能力,不从要素资源拥有和聚集的角度考察,而是分析该区域将采用何种手段或途径,实现社会要素资源(自己或他人的要素资源)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进行配置,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因此,资源配

置能力不等同于要素聚集,要素资源可以在其他地区,可以不属于本地区所有,但却能实现其他地区要素资源对自己有利的利用方式,比如通过价格控制使得其他经济区域成为自己的原材料供应地或成为产品销售地等等,实现有利于自己的分工协作模式。因此,地区要素聚集程度高并不等于要素资源配置能力高,有些地区可能要素资源并不丰富,甚至资源要素输出到其他地区,但这些都是为了实现对本地区资源的更有效利用,实现生产过程专业化分工协作,产业转移就是这种情况,对其他地区投资和产业转移是为了实现自己产业的升级,并通过转移,实现有利于自己的地区间产业分工格局,形成对其它地区产业发展的控制。产业转移并不是放弃产业,而是产业升级与资源配置能力的提高。因此,资源配置能力与要素聚集不同,聚集是要素在某一地区的集中;而配置能力,则包括扩散过程。因此,资源配置能力的影响因素与要素聚集存在差别。聚集强调的是数量的增加,而要素配置能力,则是从有限资源,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福利。

我们在借鉴已有相关定义的基础上,将区域资源配置能力定义为区域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不断取得、整合、运用内外部资源的能力。我们将资源配置能力定义为地区对资源的吸收能力以及利用能力^⑪,这样资源配置力一方面包括资源在配置过程中所具有的要素集聚能力,另一方面则是对资源的合理分配。它不仅反映的是区域内的资源量,同时反映的是区域内资源的利用效率。

面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地区资源配置能力必须不断创新提高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在地区发展过程中,较高的资源配置能力,是地区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它使该地区能够适应变化的环境,准确转换资源配置方向,左右主导周边地区资源配置格局,扩大影响范围,从而实现有利于该地区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模式,实现地区经济的良性发展。因此,对区域资源配置能力的分析重点已不是笼统的资源量,而是侧重分析形成与维护资源配置能力的具体因素以及获得这些能力的途径。

(二)影响我国地区资源配置能力因素分析

地区资源配置能力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影响相互作用,提高或降低地区资源配置能力。其中,地区环境是影响资源配置能力的一重要因素。地区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基础设施、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市场化程度与外向性、区域文化等。这些地区环境因素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各自所发挥的作用,其中,地理优势是基础,经济优势是核心,社会文化是辅助,三者相互弥补,共同促进,某一项因素的不足,可以通过其他方面的增强得以弥补,从而提高地区资源配置的效率。

(1)资源禀赋和基础设施

由于历史、地理、自然、气候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我国西部地区大多数省份地理环境闭塞,虽然自然资源丰富,但资源利用率低,破坏性资源开采与开发给当地带来了地面塌陷、地裂、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基础设施等投资硬环境落后,加大了投资的成本,影响到资本的投资效益,区域难以形成对非资源类企业的投资吸引。相比而言,东部地区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既沿江又靠海,不仅具有灵敏的商业信息,而且交通运输网络发达,这些都影响到区域资源配置能力的差异。

(2)产业结构

我国中西部地区自建国以来的产业定位就是我国的能源和原材料基地,产业起点低,资源消耗大,技术水平落后,对结构演进的推动力小,由此导致中西部地区对能源和矿产资源的控制能力明显不足。其能源、原材料价格、市场甚至开发等基本受国家或东部沿海地区的控制。伴随着西部地区资源的日渐枯竭,资源加工成本上升,然而中西部地区缺乏先进技术、资本、人力资本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延展产业链。创新能力的低下使得经济结构呈现一定刚性,导致相当一部分资源产品已由东部进口替代。另外,西部地区的产业与东部的产业结构关联效应弱,大多数产业在产业链中处于较低位置,难以进入东部企业的分工体系而嵌入其价值链中,难以获得东部产业内部转移的资源。因此,

沿海地区利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支配了中西部地区资源配置格局,形成了有利于东部沿海发展的产业分工体系。

(3)市场化和开放水平

一个地区经济运行的市场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是因为市场化程度提高有利于培育当地居民的资本精神,从而有利于提升当地居民使用资本的技巧。通过当地居民对市场的参与程度,可以提高区域整体的资源配置能力。绝大部分东部省份在市场化进程中也走在中西部前面,对外开放度、投资效率、金融服务水平等都高于中、西部地区,市场机制的作用空间较大,较高的投资利润率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着大量的外部资本,资源配置能力也较强。充裕的资金供给和市场化的传导机制相结合,可以使投资者根据投资收益变化做出灵活的调整,从而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中西部省份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与东部差距较大,同时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产品市场发育、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等方面也都存在明显差距。

四、资源配置能力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

关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发展经济学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要素分布状况及其变化,所提出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资源配置能力与区域经济差距之间所存在的关系。

(一)增长极理论与“中心—外围”理论

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佩鲁(Perroux F, 1950)^⑥的增长极理论,指出了经济增长并不是同时在任何地方出现,它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扩散,而且对整个经济具有不同的终极影响。该理论的实质,是强调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要尽可能把有限的稀缺资源集中投入到发展潜力大、规模经济和投资效益明显的少数地区,使增长极的经济实力强化,从而形成与周围地区的势差,并通过市场机制的传导作用,引导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增长极”对其他地区具有“支配”和“扩散”的特点,能够对周围的区域产生支配作用,即吸引和扩散的作用。具体地说,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技术的创新和扩散作用。第二,资本的集中与输出。第三,获取巨大规模经济效益的作用。第四,产生“集聚效应”。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赫希曼(A. O. Hirschman, 1958)^④提出的“中心—外围”理论。他认为,“增长在国际间或区域间的不平等是增长本身不可避免的伴生物和前提条件”,“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而一旦出现在某一处,巨大的动力将会使得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增长点集中。”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性以及产业部门间的关联效应不同。因此,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要实现经济增长,就要集中力量,利用有限的资源,首先发展那些关联效应较大的主导产业,并以它们为动力,带动其他产业部门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赫希曼指出增长点或核心区的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核心”内出现的聚集经济和“动态增长气氛”。但是,增长点的增长集中并不会无限地进行,因为“一旦厂商的增长在国家领土的一部分生根,它显然会产生一种力量作用于领土的其他部分。”

依据“增长极”与“中心—外围”理论,王兰(2001)^⑤按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和阶段成长理论分析,认为西部尚处于工业化初期,地区没有优势明显的发展极——增长点。经济发展一方面依赖本区域的自然资源优势,另一方面依赖于区外经济资源(资金、技术、信息、熟练劳动力)的输入。这一特点直接导致了西部区域经济结构的特殊性和自身对本地资源转换能力的薄弱和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低下的结果。

增长极理论与“中心—外围”理论对区域经济发展过程进行了详细真实的描述,认为增长在区际间的不均衡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观点为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但是遗憾的是没有对增长极的形成原因与培育问题进行探讨,难以成为经济发展与规划的理论依据,此为该理论体系的

缺陷。实际上“增长级”产业聚集,扩散效应、回波效应等,都是资源在不同情况下的配置方式的改变,我们认为引起增长极出现与转移的根本原因正是区域间资源配置能力相对强弱的变化。因此,讨论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问题,必须对地区资源配置能力进行研究。

(二)从资源配置能力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

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条件下,区域资源配置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水平。借鉴部分学者资源场的理论分析方法,不同区域经济合作与竞争的过程中,强资源配置能力与弱资源配置能力区域之间将产生资源势差,该势差大小决定了资源场力的大小,而资源场力则是推动资源流动的本质力量,资源势差一旦产生,就会对周围的资源形成吸引、聚集和扩散效应。资源场对资源的吸引、聚集和辐射促进了资源在社会经济范围内的自由流动。资源场的层次性代表了对资源利用的竞争力的不同,而资源利用的竞争力源于资源利用效益或资源实力即该区域的资源配置能力,资源配置能力强,竞争力强;资源配置能力弱,则竞争力弱。而且,资源配置能力具有自我强化机制,它作为被解释变量,又出现于影响被解释变量的自变量当中。这样资源配置就会显示出一定程度的“自我深化”。这样,从资源配置能力的角度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则从更核心和本质的层次丰富与支撑了“增长极”与“积累循环因果”理论。

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在论述过程中的极化效应、回波效应的产生也就是区域之间资源配置能力差距的变化所导致的。资源配置能力高的地区对资源配置能力低的地区会产生控制效应,通过自然资源、资本资源和人文资源向核心区转移过程,或是核心区域对边缘的辐射区域的产业转移过程,充分利用辐射区域的各种资源,或是通过价格控制、产业分工等维护自身在经济发展中的支配地位。如果落后区域无法提高自身的资源配置能力,企图通过发达地区的扩散效应、涓滴效应,缩小其与发

达地区经济差距是难以实现的。

在中国,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可以凭借其资金、技术、信息以及地缘优势,影响区域资源配置过程,从而保持自己在区域分工和利益分配中处于有利地位。而西部地区由于自然、历史、经济及体制方面的原因,社会发展滞后,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市场的适应力和竞争力处于明显弱势,伴随着资源配置能力的下降,地区间经济差距也就不可能缩小,而是进一步扩大。因此,长期以来形成的区域经济差距,需要通过消除产生这种差距的区域资源要素配置能力即要素的动员、控制、替代能力的差异来解决。

(三)从资源配置能力角度考虑区域协调发展

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认为,空间经济是一个异质集合体,各区域之间,尤其是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形成一种不平等的相互联系。在佩鲁的增长极理论中,把这种关系描述为支配和被支配关系;在弗里德曼的核心—外围理论中,把这种关系描述为权威和依附的关系。作为市场机制作用的必然产物,区域非均衡发展的存在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然而,它的合理性只局限于一定的范围内。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过大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不仅妨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不利于社会公平和政治稳定,而且还会通过传导机制,影响微观主体对资源的合理配置,固化落后地区在发展过程中所处的不利地位。

区域协调发展是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建立合理的、动态的区域分工体系,并在政府的有效干预下,在使区域不平衡差距保持在一定的可承受的范围内,实现区域经济的全面均衡发展和区域间的共同富裕。然而,我国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努力并没有收到明显的成效,其中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1)投资政策

政府对中西部投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的原因在于没有从提高中西部自身资源配置能力的角度

来考虑政策问题,虽然对中西部进行了大量投资,但这些投资并没有改变现有产业分工格局,致使中西部地区仍按有利于东部地区的方式进行资源配置,这种配置模式必然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扩大。因此,按照现有思路,中央政府的投资倾斜政策,可能无法真正起到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甚至这种投资,有可能加速这些地区的资源流失,从而扩大东西部发展差距。

(2)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产业转移政策

比较优势理论,并没有考虑到这种产业政策可能出现东西部之间垂直分工固定化趋势,形成不利于落后地区的资源配置。执行比较理论的结果将强化东部发达地区主导资源配置能力。要实现经济差距的收敛,就要提高落后地区资源配置能力,因此,需要在推进产业梯度转移的同时,从提高中西部地区资源配置能力入手,重点解决妨碍中西部资源配置能力提高的主要因素,而不是按传统发展模式,实现产业转移,并将这种分工固定化,形成不利于东西部地区的产业分工。

资源配置能力理论,从提高本地区资源配置能力出发,虽然也会采取比较优势,执行产业梯度转移。产业梯度转移策略,是落后地区为了提高资源配置能力采取的一种手段,但落后地区必须在接受产业转移过程,逐步培育自身的资源配置能力,一旦条件成熟,掌握本地区资源配置的主导权,引导本地资源投向合理领域,实现与发达地区的水平分工。这种理论与传统发展理论的区别在于,通过落后地区资本配置能力不断提高,最终实现与发达地区经济的融合。按传统理论,这种融合是困难,因为落后地区无法主导资源配置过程,所以产业发展十分被动,缺乏自我升级的能力。要突破这种局面,实现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必须通过政府协调,重视培育地区资源配置能力。

不同的资源配置能力的确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本质上表现为资源配置主体利用资源的能力。决定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方式和速度的因素也就是那些影响资源配置主体能力的因素。资源配置能力让我们看到了市场这只无形之

手的真面目,也让我们看到了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到底威力何在。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本身都有配置资源的能力。市场离不开政府,政府也需要市场,政府的资源配置能力是市场配置能力的补充。高的区域资源配置能力意味着高的增长率。造成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差距深层原因在于资源在各地区配置能力和方式上的差异性较大,而这种配置能力的差异直接导致各地资源集聚能力、整合能力、创新能力和产业集聚能力的巨大不同,从而作用于经济增长,而这种不同的地区间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造成了我国区域差距的现状。目前这种资源配置能力的不同结果却仍然作用于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且存在着这种差距有拉大趋势。缩小我国这种区域上的差异惟有加速推进资源配置能力的转变、配置能力的提高,才会使区际经济最终呈现一定的收敛性。

从地区经济发展而言,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增强落后地区资源配置能力,首先需要本地区微观主体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市场经济,要提高微观主体的资源配置能力,直接表现为当地居民和企业使用资本的技巧和能力。为此,提倡经商创业并为此提供帮助,培育创业环境,提供创业帮助,就成为促进地区资源配置能力的重要途径。从培育地区资源配置能力出发,就需要扶持本地企业的发展,虽然外来投资企业,能够促进就业,增加收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但如果地区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外来企业,却使本地区资源配置控制在外地企业的手中,从而不利于本地长期资源配置能力的提升。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引进外地企业的同时,促进本地企业的壮大,扶持本地民营企业的发展,提升水平和人力资本存量,逐步削弱外地企业对本地资源配置的影响力。

政府还可以通过提升政府配置资源的能力,提高管理水平等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提高政府行政能力,降低政府成本,减少区域交易成本,形成良好的外部经营环境。要从政策和投资两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地区政府的投资,需以提高资源配置能力为目的,各种形象工程,各种楼堂管所建设,并不

利于资源配置能力的提高。

注释:

- ① Long GenYing, China's Changing Regional Disparities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 *Economic Geography*, Vol. 75, No. 1 (Jan., 1999), pp. 59-70.
- ② Long GenYing, China's Changing Regional Disparities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 *Economic Geography*, Vol. 75, No. 1 (Jan., 1999), pp. 59-70.
- ③ 廖涛. 西部大开发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四川为例 [J]. *财经科学*, 2006 (6).
- ④ 陈良文, 杨开忠. 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变动的原因: 一个要素流动和集聚经济的视角 [J]. *当代经济科学*, 2007年5月. 第29卷第3期.
- ⑤ 陆铭, 陈钊. 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两大因素和两种力量 [J]. *云南大学学报*, 2005年第4期.
- ⑥ 姚枝仲, 周素芳. 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差异 [J]. *世界经济*, 2003年第4期.
- ⑦ 傅晓霞, 吴利学. 技术效率、资本深化与地区差异——基于随机前沿模型的中国地区收敛分析 [J]. *经济研究*, 2006年第10期.
- ⑧ 林毅夫, 刘培林. 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 [J]. *经济研究*, 2003年第3期.
- ⑨ 马栓友, 于红霞. 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收敛 [J]. *经济研究*, 2003年第3期.
- ⑩ 蔡昉, 王德文, 都阳. 劳动力市场扭曲区域差距的影响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1年第2期.
- ⑪ 傅允生. 资源配置能力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 [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7年第8期.
- ⑫ 杨治国. 地区资源配置能力分析 [M]. 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⑬ Perroux, F. 1950 *Economic space: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4: 89-104.
- ⑭ Hirschman, A.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8.
- ⑮ 王兰. 资源配置市场化与中国西部开发研究 [J].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1年第3期.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 王秀英]